

“江南卑湿，丈夫早夭”观念的由来及其演变

詹秋萍 王勇

(湖南大学岳麓书院, 湖南长沙, 410082)

摘要：《史记》中“江南卑湿，丈夫早夭”的观念很大程度上是当时南方社会现实的反映。然而，唐宋以来对于南方环境出现了越来越多的赞美之词，江南的卑湿似乎已经不再那么令人感到恐惧，将卑湿与生死直接联系观念更是趋于消弭。这一转变是南方环境变迁、医疗水平进步与南方话语权增强共同作用的结果。

关键词：江南 卑湿 医疗水平 环境变迁

中图分类号： K232 **文献标识码：** A

《史记·货殖列传》中有“江南卑湿，丈夫早夭”的说法，这一观念在中古时期非常盛行，当时人们普遍对南方的生存环境心存畏惧。对于这种观念的形成，萧璠先生曾经从南方的地理条件及其对居民健康的影响加以解释。^[1]而于赓哲先生认为，中古时期南方风土恶名主要体现了北方主流文化圈对南方的想象与偏见，所谓“南土卑湿”不仅是地理环境问题、疾病问题，更是一个文化问题。^[2]本文拟对“江南卑湿，丈夫早夭”的由来及其演变做一解读，以期有助于对这一观念的正确理解。

一 “江南卑湿，丈夫早夭”观念的由来

古代江南的概念复杂而多变。在司马迁的时代，江南可以泛指整个长江中下游以南地区。《史记·秦本纪》载：秦昭襄王三十年“蜀守若伐楚，取巫郡，及江南为黔中郡”，黔中郡在今湖南西部。同书《秦楚之际月表》载：秦亡后，义帝“徙都江南郴”，郴即今湖南郴州，已接近南岭。《绛侯周勃世家》载：吴楚七国之乱失败后，吴王刘濞败走，“保于江南丹徒”，丹徒在今江苏南部。长江中下游江以南地区地势低平，雨量丰沛，河湖密布，素有“水乡泽国”之称。《尚书·禹贡》记载：“荆及衡阳惟荆州……厥土惟涂泥，厥田惟下中”，“淮、海惟扬州……厥土惟涂泥，厥田惟下下”。泥在古代是指水与细土的调和。《释名·释丘》：“水潦所止曰泥丘，其止污水留不去成泥也”；《广韵·齐韵》：“泥，水和土也”；《易·震》“震遂泥”，李鼎祚《集解》引虞翻曰：“坤土得雨为泥”。荆州、扬州的土壤在先秦被称为“涂泥”，必然是因为水分含量非常高，以致潮湿如泥。《水经注·沔水》也记载：“东南地卑，万流所凑，涛湖泛决，触地成川，枝津交渠。”可见，“江南卑湿”中的“卑湿”其实是对长江中下游江以南地区地势低下、气候湿润的客观描述。而值得注意的是，司马迁将“卑湿”与“丈夫早夭”联系在一起。

对于江南的卑湿环境，秦汉以来人们长期普遍心存畏惧。《史记·屈贾列传》载：贾谊被贬为长沙王太傅，因“长沙卑湿，自以为寿不得长，伤悼之”。《后汉书·城阳恭王祉传》载：春陵侯刘仁“以春陵地执下湿，山林毒气，上书求减邑内徙”。同书《马援传》载：马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汉晋南朝长江中下游地区农业开发与生态环境关系研究”（课题批准号：15BZS040）

援之子马防“坐徙封丹阳，防以江南下湿，上书乞归本郡”。《宋书·良吏传》载：阮长之“迁临川内史，以南土卑湿，母年老，非所宜，辞不就”。《梁书·王亮传》载：王亮“出为衡阳太守。以南土卑湿，辞不之官，迁给事黄门侍郎”。这种对江南地区的畏惧心理，主要来自人们对于卑湿环境与疾病之间关系的认识。因为不仅是对于南方的卑湿环境，事实上，对于北方的潮湿环境，古人也是努力回避的。《左传》成公六年载：晋人准备迁都城于郟、瑕氏之地，韩献子反对说：“郟、瑕氏土薄水浅，其恶易覩，易覩则民愁，民愁则垫隘，于是乎有沉溺重腿之疾。不如新田，土厚水深，居之不疾。”《孙子兵法·行军篇》也说：“凡军好高而恶下，贵阳而贱阴，养生而处实，军无百疾，是谓必胜。”《墨子·辞过》说：“古之民，未知为宫室时，就陵阜而居，穴而处，下润湿伤民，故圣王作为宫室。为宫室之法，曰室高足以辟润湿。”

人生活在潮湿的环境中，相对容易患病。前引《左传》“郟、瑕氏土薄水浅……于是乎有沉溺重腿之疾”。这里提到的沉溺为风湿病，重即今“肿”字，腿意为足肿，应该是就是传统医学所谓“脚气”。这类疾病往往是由于地下暑湿之气上升，侵入人体而引起的。《医心方》卷8引《拯要方》说：“因居卑湿，湿气上冲，亦成脚气。”风湿、足肿中古时期在长江中下游地区都是较为普遍的疾病，长沙出土的走马楼吴简中便有不少“肿足”的记录，如“妻大女黄年廿四肿两足（1—1）”，“妻大女口年廿五算一肿两足复（9—3069）”。

^[3]《三国志·吴书·朱然传》记载：“魏攻江陵，时（朱）然城中多肿病，堪战者裁五千人。”《魏书·岛夷萧衍传》记载：“自（侯）景围建业，城中多有肿病，死者相继。”同书《僭晋司马睿传》称：东晋“地既暑湿，多有肿泄之病”。

南方不仅多雨潮湿，而且气候炎热，河床纵横，给各种病原体和作为疾病感染媒介的蚊虫等提供了良好的繁衍条件，因而是疫病的多发地。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主人辛追尸体的肝脏、直肠及乙状结肠组织中均发现了成堆的血吸虫卵，每堆虫卵数目从几个到几十个不等，最多可达100多个。研究者认为，她可能就是因为受污染的疫水上泛舟游玩而感染了日本血吸虫的。^[4]江陵凤凰山汉墓古尸的肝脏组织中，也检查出了较多的血吸虫卵以及人鞭虫卵、绦虫卵，反映了这种流行病当时在南方比较普遍。《三国志·魏书·郭嘉传》注引《傅子》，曹操在给荀彧的书信中曾提到：“人多畏病，南方有疫，常言：‘吾往南方，则不生还。’”《洛阳伽蓝记》卷2“景宁寺”条载北魏杨元慎评价说：“江左假息，僻居一隅。地多湿蛰，攢育虫蚁，壅土瘴疠。”当时北方对南方的征战，便多次受困于“暑湿”可能导致的疟疾流行。《后汉书·马援传》记：马援南征武陵蛮夷，“会暑甚。士卒多疫死，援亦中病，遂困，乃穿岸为室，以避炎气。”《晋书·文帝纪》载：司马昭谋划伐吴、蜀的先后时指出吴国“南土下湿，必生疾疫”。《魏书·崔浩传》载：崔浩以“南土下湿，夏月蒸暑，水潦方多，草木深邃，疾疫必起”，劝阻拓跋焘讨伐南朝。

男少女多是历史早期对于南方地区的普遍印象。《周礼·夏官·职方氏》载各州人口性别比，扬州“其民二男五女”，男女之比为2:2.5。荆州较之稍高，“其民一男二女”。而北方各州中，豫州、青州、兖州“二男三女”，雍州“三男二女”，幽州“一男三女”，冀州“五男三女”，并州“二男三女”，平均男女之比为1:1.39。近代医学告诉我们，从出生到老死，男性的死亡率一直高过女性，并且男性对疾病的抵抗力远低于女性，加之男性是户外劳作的主要从业者，其接触有病原体的水域、草木以及受伤病侵袭的几率也远大于女性。西汉以前气候较今温暖，长江流域的气候相当于现在疾病繁多的亚热带地区，男少女多应该是正常现象。即是在气候相对凉爽的三国时期，长江流域男性的疾病率和死亡率也远远高出同年龄段女性。据学者对走马楼吴简所载孙吴长沙郡临湘侯国数据的统计，在总共218

例疾病人口中，“15~100岁成年男性的疾病人数为112例，占总疾病人数的51.4%，15~100岁成年女性的疾病人数39例，只占总疾病人数的17.9%”，“有30例为0~15岁未成年男性，占到总疾病人数的13.7%”，“0~15岁未成年女性患病仅2例，只占到总疾病人数的0.91%”。^[5]

《史记·龟策列传》中有“余至江南，观其行事，问其长老”，“江傍家人常畜龟饮食之，以为能导引致气，有益于助衰养老，岂不信哉”之语，可知司马迁曾亲身前往江南实地考察，他对于江南的描述是可信的。所谓“江南卑湿，丈夫早夭”，应该是当时江南的实际情况。《淮南子·地形训》称：“暑气多天，寒气多寿”，“南方，阳气之所积，暑湿居之。其人……早壮而夭。”《南史·顾协传》载：梁武帝曾说“北方高凉，四十强仕，南方卑湿，三十已衰”。可见在汉晋南朝，即便是南方本地人，也认为南方的卑湿环境对人的健康不利，会令人短寿。

二 “江南卑湿，丈夫早夭”观念的演变

卑湿最初可能是对地势低下、气候潮湿的描述，但因为往往与“丈夫早夭”联系在一起，而逐渐带有贬义，成为环境恶劣的代名词。唐宋时期，对于长江中下游以南地区的环境，仍然有使用卑湿一词的。唐代诗人刘禹锡《谪居悼往二首》有“邑邑何邑邑，长沙地卑湿”，戴叔伦《过贾谊旧居》有“楚乡卑湿叹殊方，鵬赋人非宅已荒”，白居易《孟夏思渭村旧居寄舍弟》有“九江地卑湿，四月天炎燠。苦雨初入梅，瘴云稍含毒”。时常也出现北方人任职南方时试图回避的情况。《旧唐书·柳公绰传》载柳公绰被任命为潭州刺史、充湖南观察使，“湖南地气卑湿，公绰以母在京师，不可迎侍，致书宰相，乞分司洛阳，以便奉养，久不许”。《宋史·宋太初传》载：宋太初在真宗时出知杭州，“太初有宿疾，以浙右卑湿不便，求近地，得庐州”。然而，不同于此前几乎众口一词的“卑湿”差评，这一时期已经出现很多对于长江中下游以南地区环境的赞美之言。

唐代大量以江南为主题的诗歌，都是赞美江南风光的美好。白居易《忆江南》：“江南好，风景旧曾谙，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能不忆江南？”《吴中好风景》：“吴中好风景，八月如三月。水荇叶仍香，木莲花未歇。海天微雨散，江郭纤埃灭。暑退衣服干，潮生船舫活。两衙渐多暇，亭午初无热。骑吏语使君，正是游时节。”杜甫《江南逢李龟年》：“正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韦庄《菩萨蛮》：“人人尽说江南好，游人只合江南老。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垆边人似月，皓腕凝霜雪。”皇甫松《梦江南》：“闲梦江南梅熟日，夜船吹笛雨潇潇，人语驿边桥。”温庭筠《菩萨蛮》：“宝函钿雀金鸂鶒，沉香阁上吴山碧。杨柳又如丝，驿桥春雨时。画楼音信断，芳草江南岸。”陆龟蒙《江南曲》：“为爱江南春，涉江聊采蘋。”唐人甚至已经用塞北江南来夸赞宁夏平原的美景。韦蟾《送卢潘尚书之灵武》云：“贺兰山下果园成，塞北江南旧有名。”

唐宋时期，人们仍然相信长江流域由于相对于北方要潮湿多雨，疾病容易流行。《全唐文》卷149褚遂良《潭府帖》称：“潭府下湿，不可多时，深益愤懑，况兼年暮，诸何足言，疾患有增，医疗无损。”同书卷599刘禹锡《楚望赋》称：湘沅之地“天濡而雾，土泄而泥。气罕淑清兮，淫氛曠曠，中人支体兮，为瘡为瘵”。《宋史·胡安国传》载：“以安国素苦足疾，而海门地卑湿，乃除安国右文殿修撰、知通州”。宋人杨亿对此更可谓身有体会。《宋朝事实类苑》卷61《风俗杂志》引《杨文公谈苑》称：“《春秋》传曰‘土厚水深，居之不疾’，言其高燥。予往年守郡江表，地气卑湿，得痔漏下血之疾，垂二十年不愈，未尝有

经日不发。景德中，从驾幸洛，前年从祀汾阴，往还皆无恙。今年退卧颍阴，滨嵩山之麓，井水深数丈而绝甘，此疾遂已。都城土薄水浅，城南穿土尺余已沙湿。盖自武牢以西，接秦晋之地，皆水土深厚，罕发痼疾。”《宋史·宋瑄传》亦记载：宋瑄于淳化中知苏州，“瑄体丰硕，素病足，至州，地卑湿，疾益甚”。

然而，唐宋时期江南的卑湿在人们看来似乎已经不再那么恐怖。《唐文萃》卷54载张渭《长沙土风碑铭（并序）》写道：“巨唐八叶，元圣六载，正言待罪湘东。郡临江湖，大抵卑湿，修短疵疠，未违天常，而云家有重腿之人，乡无斑白之老，谈者之过也。地边岭瘴，大抵炎热，寒暑晦明，未愆时序，而云秋有焮曦之日，冬无凛冽之气，传者之差也。”长沙是西汉贾谊感伤之地，而张渭在此虽然承认长沙“大抵卑湿”，却驳斥了北人对长沙“多下湿之疾，多夭寿之人”的刻板印象，并感慨“巴蛇食象，空见于图书。鸚鸟似鴞，但闻于词赋。则知前古之善恶，凡今之毁誉，焉可为信哉”。唐人张籍《江南曲》描绘江南“土地卑湿饶虫蛇，连木为牌入江住”，但诗人却很享受在江南的生活，称“江南风土欢乐多，悠悠处处尽经过”。当时甚至出现了“乐卑湿”的言辞。宋人曾巩《南湖行》之一云：“二月南湖春雨多，春风荡漾吹湖波……生长江湖乐卑湿，不信中州天气和。”

唐宋时期让北方人普遍畏惧前往的，不是长江中下游以南地区，而是更加南方的岭南。《隋书·地理志下》强调：“自岭已南二十余郡，大率土地下湿，皆多瘴疠，人尤夭折。”当时长江中下游以南地区已经被排除在令人“早夭不寿”的地域之外。岭南在唐宋以前也是人们所熟悉的卑湿地区。《史记·南越列传》中有南越王赵佗自称“南方卑湿”的记载，汉初与南越交战，“高后遣将军隆虑侯灶往击之，会暑湿，士卒大疫，兵不能逾岭。”《汉书·严助传》载武帝用兵南越前，淮南王刘安曾上书谏止，强调“南方暑湿，近夏瘴热，暴露水居，蝮蛇蠹生，疾病多作，兵未血刃而病死者什二三，虽举越国而虏之，不足以偿所亡”。与长江流域不同，唐宋时期人们对岭南地区环境恶劣的印象似乎并未改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11仁宗明道元年二月丙午：“诏入广南官者毋得过两任。初，监察御史蒋堂言：‘五岭，炎瘴之地，人所惮行，而比部员外郎江泽三任皆愿官广南，若非贪黷，何以至此？’故条约之。”江泽因为愿意在广南为官三任，竟然遭到监察御史弹劾，而朝廷亦据此专门就为官岭南的任期制定法令，足见岭南仍然是时人看来相当可怕的居留之地。韩愈被贬潮州经过蓝田关时，侄孙韩湘赶来与他同行，韩愈在《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中写道“知汝远来应有意，好收吾骨瘴江边”。

明清以来，将卑湿与生死直接挂钩的观念已经趋于消弭。除了《明史·夏良胜传》记载夏良胜曾以“南方卑湿，尤易致病”劝谏武宗南巡，《明史》与《清史稿》中提到“卑湿”的地方都是与房屋、粮食容易腐朽等联系在一起。《明史·诸王传四》载宪宗子雍靖王祐楨“弘治十二年之藩衡州，地卑湿，宫殿朽败不可居”。《清史稿·范文程传》载：范承勋以“江南地卑湿，仓谷易朽蠹”，奏请江苏、安徽各州县于每年春夏间以仓谷平糶，出陈易新。同书《方苞传》载方苞上疏言：“常平仓谷例定存七糶三。南省卑湿，存糶多寡，应因地制宜，不必囿成例。”《徐栋传》载：徐栋为兴安知府，“旧禁运粮下游，栋以兴安卑湿，积穀易霉变。既不能久储，又不能出境，图利者改种菸叶、蓝靛，歉年每至乏食。乃弛运粮之禁，民便之”。与此同时，即便是对最为暑湿的岭南地区，人们的恐惧心理似乎也已不再强烈。清人屈大均《广东新语》卷1载：“岭南之地，愆阳所积，暑湿所居……当唐、宋时，以新、春、儋、崖诸州为瘴乡，谪居者往往至死。仁人君子，至不欲开此道路。在今日岭南大为仕国，险隘尽平，山川疏豁。中州清淑之气，数道相通。”

三 促成观念转变的因素分析

“江南卑湿，丈夫早夭”的观念在中古时期可谓深入人心，然而唐宋以来这一观念却逐渐动摇，直至完全消弭。是什么因素促成了这一观念的转变呢？以下试就此略做分析。

首先，这应该是南方环境变迁的客观后果。南方卑湿与这里地势低下、降水丰富的自然条件是联系在一起的。然而，尽管多雨的气候非人力所能改变，通过人工的方法，却能对地势进行局部的改造，使卑湿的环境状况得到改善。《文苑英华》卷 831《鄂政记》记唐代事：“鄂城置在岛渚间，土势大凹凸，凸者颇险，凹者潴浸，不可久宅息，不可议制度……公命削凸堙凹，廓恢闾巷，修通衢，种嘉树，南北绳直，拔潴浸者升高明，湖泽瘴疠，勿药有愈。”这里“削凸堙凹”，目的就是消减城内死水、浅水的面积，“拔潴浸者升高明”。这种刻意的做法影响范围自然有限，但是通过农田水利建设逐渐将分散的、多余的积水汇积起来并分排放出去，将原来的低凹积水处修整为膏腴良田，却能在不知不觉中让整个地域的环境发生大的改观。

南方农田水利建设的主要工程类型是修建陂塘与开凿塘浦，前者是利用低洼之地汇集周边水源而形成的池塘，后者是利用两岸之间的河渠进行排水、蓄水，同时利用堤岸挡水的工程，两者都能够挤自然地形上的浅水流向积水深处，实现浅滩沼泽的陆地化。南方的农业生产以稻作为主，水田是最基本的农田形态。每块水田都必须具备排、灌的条件，因此客观上也就有吸纳降水与排干地表多余水分的能力。随着农田水利建设的发展与农田范围的扩展，原本遍布于南方地区的沼泽浅滩，由于积水越来越多地被挤到江河湖塘中蓄积起来或者排泄入海，而大量陆地化了；汛期洪流横溢，平原地区一片泽国的情况也得到有效控制。南方环境“卑湿”的程度自然也就能相应得到改善。

唐宋时期经济重心南移，江南是全国农业最发达的地区，农田水利设施相当完善。以地势最为低洼的太湖流域而言，朱长文《吴郡图经续记》卷下《治水》记载：五代时这里“或五里、七里而为一纵浦，又七里或十里而为一横塘。因塘浦之土以为堤岸，使塘浦阔深，而堤岸高厚”。塘浦圩田纵横有序，有如棋盘，保证了排水的顺畅。相反，岭南地区的开发在唐宋时期尚相当落后，由于缺乏人为的约束，免不了雨季时洪水泛滥漫溢而成为泽国。因此，当时人们对于江南环境的恐惧感渐渐消失，而对于岭南环境的恐惧感仍然强烈，应该是有事实依据的。

其次，这应该与医疗水平的进步有关。南方民族有“疾病不事医药”的传统，医疗知识在很长时间内都不如北方发达。汉晋时期人们对于南方的疾病，往往笼统地与暑湿、虫毒联系在一起，对其病因缺乏较为深入的认识。汉晋之间形成了瘴气与瘴病的概念，包括长江中下游在内的南方地区当时是瘴气的主要分布区。瘴病主要是指称恶性疟疾一类的传染病，但实际上南方地区所有的不明疾病都可能被归结为瘴气所致。学者指出：“直到唐朝初年，瘴疾依然被分列于不同的疾病证候类别，似乎表明医家对瘴疾的了解还很模糊。”^[6]宋人周去非《岭外代答》卷 4《风土门·瘴》称：“南方凡病，皆谓之瘴。”宋人章杰《岭表十说》也提到：“岭外虽以多暑为患，而四时亦有伤寒、温疫之疾，其类不一，土人不问何病，悉谓之瘴。”

唐宋以来，人们对于南方地方病的认识不断提高。以南方地方病中最令北方人恐惧的疟疾而言，唐宋时期已经出现预防的药剂。白居易《十二年冬江西温暖，喜元八寄金石凌到，因题此诗》有“欲将何药防春瘴，只有元家金石凌”，元稹《遣病十首》有“服药备江瘴，四年方一疴。岂是药无功，伊予久留滞。滞留人固薄，瘴久药难制”。苏轼、沈括的《苏沈良方》卷 3 也记载有一个治疗瘴病的方子，并指出“瘴疾皆因脾胃实热所致，常以凉药解膈

上壅热，并以此药通利，弥善；此丸本治岚瘴及温症，大效”。宋人王荣《指述方瘴论》说瘴：“轻者，寒热往来，正类疟症，谓之‘冷瘴’；重者蕴热沉沉，昼夜如卧炭火中，谓之‘热瘴’；其尤重者，一病则失音，莫知其所以然，谓之‘瘖瘴’。冷瘴必不死，热瘴久而死，瘖瘴无不死者。”可见当时对于瘴病的病症、发病时间及严重程度、治愈情况都有一定的认识。而医家也已经知道按照瘴病的不同症状，对症进行治疗。宋人陈师中等《太平惠民和剂局方·指南总论》指出，瘴症“虽是时行之疾，然老少虚实，受病有浅深，大率不同”，应当“随症用药，若只言瘴病，一概治之，万一不能取效也。”尽管前往南方难保不会染疾患病，但既然这些疾病并非不可预防与治疗，人们的畏惧之心自然会大大减轻。

最后，这应该是南方话语权增强的反映。北方人由于对南方地方病缺乏免疫力，南下后因水土不服等原因容易罹患疾病，尤其是大规模对南战争、戍边时，军队中往往容易爆发疫病。在南北交流不是很多的情况下，这给北方人留下了南方水土容易致人疾病并早夭的深刻印象。“江南卑湿，丈夫早夭”，事实上更多的是北方人对南方环境的认识。隋唐以前南方经济、文化远远落后于北方，话语权掌握在北方知识阶层手中，能够替南方开脱者很少。加之长期处于潮湿的环境确实容易患病，北方人对于南方疾病地理的认识在南方士人中也有很大影响，从而导致南方土地卑湿而致人早夭的看法深入人心。

唐宋以来南方经济、文化发展，知识分子阶层不断壮大，来自南方的士人掌握了越来越大的话语权。他们的文章、诗赋不仅细腻地描写了南方自然景观的美好，而且有意识地驳斥北方人对南方环境的刻板印象。清人张际亮《张亨甫全集》卷19《谒先文献祠》称：“刘禹锡贬连州，乃追怨张曲江昔曾言流官不宜与善地，故卒无后云云。然唐时岭南节度已为雄镇，其僚佐多一时名流，未闻有瘴乡之感。然则诸臣过岭而愤限不平者，皆为迁谪故耳，岂必果其地水土恶劣哉！今中外一家，南北富庶，然南方实乐于河朔，以今推昔亦可知也。”尽管张际亮是用清代的情况来驳斥刘禹锡在唐代的认识，但类似的言论无疑会促使人们重新思考对南方环境的认识。

唐宋以来南北交流增强，许多北方士人在久居南方后，他们对于南方环境的认识事实上也在改变。《苏轼文集》卷71《书海南风土》写到：“岭南天气卑湿，地气蒸溽，而海南⁷尤甚”，但他看到的情况是“僮耳颇有老人，年百余岁者，往往而是，八九十岁不论也”，“乃知寿夭无定，习而安之，则冰蚕火鼠，皆可以生”。可见有过在南方的亲身体验后，北方的知识阶层往往同样能够站在南方的立场，对南方环境做出更为客观的评价，使得南方卑湿致人早夭的观念日趋淡化。

参考文献

- [1] 萧璠. 汉唐间文献所见古代中国南方的地理环境与地方病及其影响[C]//李建民. 台湾学者中国史研究论丛(生命与医疗). 北京: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2000: 193-298.
- [2] 于赓哲. 疾病、卑湿与中古族群边界[J]. 民族研究, 2010(1): 65.
- [3] 王素, 宋少华, 罗新. 长沙走马楼简牍整理的新收获[J]. 文物, 1999(5): 33.
- [4] 谈正吾. 西汉女尸怎么会患血吸虫病[J]. 历史大观园, 1988(3): 23.
- [5] 高凯. 从吴简看孙吴时期的性比例失调和疾病人口问题[C]//李凭. 中国三国历史文化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 武汉: 湖北人民出版社, 2012: 187-188.
- [6] 左鹏. 宋元时期的瘴疾与文化变迁[J]. 中国社会科学, 2004(1): 200

The Origin and Evolution of “Southern Belcher wet, the men die young”

Zhan Qiuping; Wang Yong
(Yuelu Academy, Hunan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82)

Abstract: The viewpoint of “Southern Belcher wet, the men die young” in Records of the Historian reflected the social reality in south China at that time. However, more and more praises of the southern environment were appeared since Tang and Song Dynasties. “Southern Belcher wet” seemed not to be so scared anymore, and the descriptions of Belcher wet directly related to death were almost disappeared. The transition attributed to three factors: the environmental change of south China, the improvement of medical level, and the obtainment of more discourse rights for the Southern people.

Keywords: south China; Belcher wet; medical level; the environmental change

作者简介 (可选): 詹秋萍 (1989-), 女, 福建三明人, 湖南大学岳麓书院研究生。研究方向: 农业史。
王勇 (1975-), 男, 湖南武冈人, 博士, 湖南大学岳麓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 农业史。